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

文/李路路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在结束了从低收入国家迈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新的历史时期,回顾中国社会经历过的变迁过程,探讨新时期所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对于实现中国两个100年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在一定的意义上,中国社会40年的变迁,其核心可以看作是现代化和体制变革双重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计划到市场、从集中到分散、从一元到多元、从固定到流动和从封闭到开放的变革。其中,社会结构的变革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变革之一。在社会学看来,社会结构可以界定为不同社会群体或集团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是决定社会成员行为和态度的基本因素。

社会结构也可以从多种维度进行分析。在各种分析维度中,阶级阶层维度的地位最为特别:阶级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部分,社会结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阶级阶层结构是社会关系、社会利益、社会激励、社会资源与机会分配、社会矛盾与冲突最重要的结构基础之一。因此,从社会学的视角看,阶级阶层结构的转型是整个社会转型的核心过程之一,本文将从阶级阶层结构变迁出发阐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并以此透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讨论新时期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社会结构转型的分析可以从分化和流动两个基本维度上展开。分化是对社会结构状况的分析,关注的是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相对独立的状况;流动是通过对社会成员在不同地位之间流动的分析,来反映社会结构的开放性或社会的机会结构状况。在变迁或转型的语境下,二者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社会结构的分化

中国社会学家早在1990年代大规模市场化改革刚开始时,就已使用社会分化的概念来揭示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

(一) 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体系

正如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一样,学界对传统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体系,始终存在不同的看法或理论解释。但是,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基于一个共同的知识内核,即:这是一个与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相对同质性的等级结构体系。也就是说,首先,这一结构体系并非是完全平等的或同质的,而是存在阶级阶层差别或身份等级差别的。其次,这种差别是相对的,它们都来源于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高度集中的国家再分配体制,是以国家再分配体制为基础形成的结构体系;不同社会群体或集团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和机会,是国家自上而下决定性或命令性分配的结果,即国家决定,国家分配,国家协调。再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结构体系是相对同质性的,用一个政治的概念来表达的话,就是说都是属于“人民”的范畴,除了人民的敌人。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在这样的结构体系中,结果的高度平等(例如收入)和稳定的机会不平等(例如户籍)同时存在,它们都是国家集中再分配的结果。

(二) 社会结构分化-阶级阶层分化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最基本的变革是从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开始的。在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分配领域,市场机制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乃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被定义为起决定作用的协调机制。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发展,逐渐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分配的机制和结果,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重组,包括国家和市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一个曾经是高度集中、相对同质性的社会结构体系逐渐向资源、地位、机会和利益相对分散、相对独立的结构体系转变。这一过程被称为社会结构分化的过程。高度集中、高度同质化的社会结构在市场化过程中走向日益分化的过程,是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结构变革的核心。

但是,社会结构分化仍然是一个相对抽象的结论。一般来说,有三种社会结构分化的形式具有代表性,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结构分化,是中国社会从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转变为收入(财富)差距

日益拉大的社会，这是一种带有浓厚经济学色彩的视角。第二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强调利益群体和利益关系。在这种观点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是原有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国家集中再分配资源和利益的结构转变为多元化的结构成分和市场化的分配机制。因此，如何调整上述日益分化、矛盾的利益诉求，整合日益多元化的利益群体或集团，成为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这是一种更多带有政治学色彩的视角。

一部分研究者，包括笔者认为，社会结构分化最重要的表现，是过去高度集中、相对同质性的社会正在逐渐分化为一个阶级阶层社会，或者说是从过去国家建构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框架或身份等级社会转变为复杂的阶级阶层社会。在纷繁复杂的分化过程中，其中最重要、最基本、也最稳定的分化，是社会的阶级阶层化，即以阶级阶层的形式构成的新的权力主体，因而意味着社会权力结构的分化，意味着以阶级阶层和社会权力为基础的新的利益结构的形成。

不同于基于量化的社会经济指标和泛化的利益概念，更不是基于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模式，复杂的阶级阶层分化是基于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上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而形成的，因此是更深刻、更稳定、更具矛盾与冲突性的利益矛盾与冲突。

从经典阶级分析到现代阶级分析

众所周知，自1978年开始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其标志性符号即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曾经在改革开放后相当一个时期内，阶级阶层分析作为一种概念工具在学术界几乎销声匿迹。但是，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重返阶级分析的呼声开始兴起并日益高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导致了研究范式的转变。

如果回过头来看阶级阶层分析的兴起，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结构变革对理论发展的影响。1992年，中国开始了自上而下大规模的市场化进程，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种变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最早对这种变革做出反应的，是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该思想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党和国家第一次正式提出“新社会阶层”的概念。无独有偶，学术界最早的阶级阶层范式转换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比如《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于2002年出版，一系列论文随后发表。阶级

阶层分化和阶级阶层分析正式重新进入人们的分析视野。

毋庸讳言，阶级阶层概念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且有些敏感的概念。这种敏感性和争议性除了来自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带来的沉重浩劫，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中国社会所熟悉和习惯使用的阶级概念和阶级理论均来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阶级结构上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呈现为两极对立的二分结构，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阶级关系上它强调这种阶级关系是和剥削、压迫、革命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阶级之间的利益对抗是“零和博弈”式的关系。

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实际上早已在巨大的社会变迁面前就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的兴起，社会主义社会在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消灭了“经典”的资产阶级后是否还存在阶级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转型社会使得这一理论滞后现象更为突出。当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和机会分配中逐渐起到决定性作用后，当整个社会结构伴随着市场化过程日益走向分化时，仍然坚持用敌对阶级理论解释转型社会的阶级阶层分化就显得捉襟见肘。

当理论遭遇现实的挑战时，理论必定会进行创新，新的概念和理论将被创立以解释新的社会现象。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内，还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内，都对新的挑战作出了回应，这就是现代阶级理论。

现代阶级理论的核心之一，是面对社会的复杂化（包括西方社会的复杂化，包括传统社会主义所带来的制度变迁），力图在经典理论概念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尽管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非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及内部均存在本质的区别，但在发展新的阶级分析范式上表现出了共同之处：第一，阶级基础或阶级形成的资源因管理革命和技术革命而多元化——组织权力、技能资本、文化符号等，与资产的占有有一样，都构成了重大的社会区别的基础，从而构成了阶级形成的基础（阶级资源多元化）；第二，在此基础上，社会关系、雇佣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因阶级资源的多元化而复杂化；第三，阶级形式的多样化，即在这些关系和资源基础上形成的阶级其形式也是多样化的；第四，阶级关系和阶级形式的多样性导致阶级行动的多样性，即“非暴力”斗争、选举、谈判、妥协等都是阶级的行动形式；第五，阶级影响的多样性，即革命—社会矛盾与冲突—生活机会的分配等都是阶级的效应。

由此，现代社会的“阶级”得到了新的再定义：与社会复杂化变化相联系，作为阶级的利益群体是占有某种资源或资本（例如资产、组织、技能或知识），因而具有某种权力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集团。因此，阶级是通过以封闭与排斥、合作与竞争、剥削与支配、对抗与冲突等多种形

式追求社会资源和生活机会的占有及以相应社会权力为目标的利益群体。

因此, 阶级概念的复兴绝不仅仅是因为转型社会中仍然存在敌对阶级, 更重要的是, 转型社会的结构分化呼唤现代阶级阶层理论。在某种意义上, 突破了敌对阶级概念的阶级阶层分化在中国社会中早已发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 早已突破了敌对阶级理论的范畴, 新的社会阶层将在中国社会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构成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利益群体。伴随中国社会迈向新的历史时期, 以新的社会阶层为基础, 新的利益结构的重组和整合都将是不可避免的。敌对阶级理论面对的更多是革命的问题, 而现代阶级阶层理论面对的更多是多元化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整合问题。

毫无疑问, 现代阶级阶层理论, 包括“新的社会阶层”概念的提出, 并没有完全解决对当前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分化的理论认识, 特别是基于不同的理论传统的概念, 远未形成一种统一的理论体系。例如, 阶层和阶级概念的区分或联系是什么, 是否存在旧的社会阶层, 和新的社会阶层相对的其他群体是否构成了社会阶层, 新的社会阶层和老的社会阶层、其他社会阶层之间是什么关系, 阶层形成的基础和过程是什么, 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我们做出进一步的理论创新。

社会流动的模式与趋势

近年来, 相较于阶级阶层结构的分化, 阶层间代际流动的问题似乎引起了更大的社会关注。从“我爸是李刚”到天价学区房炒作, 到各种“拼爹”说法的流行, 在阶级阶层分化基础上逐渐定型的阶级阶层结构是固化还是流动的、是封闭还是开放的问题, 已经成为社会结构分析的热点问题。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相对于分化的状况和程度, 阶层间代际流动的状况和机制更是直接反映了阶层结构的基本特征, 彰显了阶层之间的关系模式、社会的基本秩序和机会结构。

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分析主要关注的是代际流动的状况、趋势、机制和效应。由于资料和数据限制, 现在进行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流动状况和趋势以及国际比较方面, 对于影响机制的分析大多借助于间接的材料。

根据笔者和合作者在2015年进行的研究以及其他学者所进行的研究, 虽然这些研究依据的是不同的数据, 所使用的阶层框架不同, 分析策略和方法也有所区别, 但是结论是相似的, 即: 从总流动率的角度来看, 改革开放40年来代际流动呈现出不断提升的趋势。但是, 从相对流动率的角度来看, 阶层间代际继承性是主导模式, 但阶层间代

际关联度则呈现出波动式的变化趋势, 即代际关联系数经历了一个高低起伏的波动过程。

国际学术界的大量研究表明, 阶层间代际流动的主导模式是代际继承和短距离流动。但是, 后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分析表明, 现代化和理性化的程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阶层间的代际流动水平。这一争论至今也没有结束的迹象, 也许需要更长的历史过程, 或更科学的国际比较。因此, 中国社会即使出现了阶层间代际流动固化的现象, 虽然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但也并不是特别的现象。之所以人们对固化现象表现出特殊的兴趣,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 人们相信某种现代化或理性化的逻辑, 认为代际继承或固化是传统社会的现象; 第二, 人们相信市场化会带来自由、公平、平等的竞争, 在一个追求效率的市场体制中, 业绩决定了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因此, 至少在阶层间代际流动的意义上, 现代化和市场化都带有某种迷思和神话的色彩。

其实, 现有的一些国际比较研究表明, 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间代际关联度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 属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 这些国家既包括一些与中国相似的转型国家, 也包括一些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具有独特性。应该说, 中国社会所具有的这种独特性仍然离不开上述两个基本影响因素——现代化和市场化。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 现代化要素前所未有地扩散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次; 同时, 改革开放本身的基本含义, 就是中国社会在这40年中经历了巨大的体制变革, 从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规模转型, 一方面极大改变了全社会的资源分配机制, 另一方面为过去没有机会或机会很少的社会成员创造了众多的、全新的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而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开放过程已经持续了40年之久, 并且还将至少再持续40年。正是中国社会这独一无二的发展和转型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社会相对更高的阶层间代际流动率。当然, 一些和中国表现出类似代际关联度的国家, 在很大程度上更有可能是由他们自身的独特性所决定的。

尽管人们无法期望中国社会阶层间的代际流动摆脱所谓固化的结果, 但人们确实有理由对代际流动趋势表示担心。扩大唯才是举的业绩主义机制, 限制各种阶层再生产的机制, 依靠国家的力量继续深化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改革, 会有助于减少阶层固化的现象, 加快阶层间的代际流动; 而一个不断提升的代际流动率, 会有助于减少阶层固化带来的阶层间的矛盾和冲突, 优化社会机会结构, 激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⑤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摘自《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1期】